

双头鹰文库

方珊 张冰 ■ 主编



A H E M A T U O W A Z H A J I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

[俄] 莉季娅·丘科夫斯卡娅 著



华夏出版社

诗的隐居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1938~1941

[俄]利季娅·丘科芙斯卡娅 著

张 冰 吴晓都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的隐居·阿赫玛托娃札记 1:/(俄罗斯)丘科芙斯基卡娅著;张冰,吴晓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

(双头鹰文库)

ISBN 7-5080-2339-0

I. 诗… II. ①丘… ②张… ③吴… III. 日记-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8661 号

Записки об Анне Ахматовой 1938 - 1941

© Е. Ц. Чуковская, 1997

© Е. Б. Ефимов, Ж. О. Хавкина, Е. Ц. Чуковская,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Ташкентским тетрадам», 1997

© Е. Ц. Чуковская, послесловие, 1997

© А. М. Юлико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формление, 1997

© «Согласие», 1997

本书俄文版于 1997 年出版,版权为 Согласие 所有。

本书中文版权由 Согласие 授予华夏出版社,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

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出版者: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邮编:100028,电话:64663331 转)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印刷者: 北京先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17.2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 序

方 珊

俄罗斯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绚丽的明珠,尽管它历经磨难,仍不失其灿烂耀眼的光辉。

俄罗斯文化的历史渊源应追溯到生活在第聂伯河和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古斯拉夫人。公元6—7世纪时,斯拉夫人信仰的还是多神教,从事农耕生产。原始公社解体后,开始了封建化的历程。9—10世纪,斯拉夫人接受了基督教,成为斯拉夫文化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表明斯拉夫文化进入基督教文化圈。1054年东西基督教会分裂,使基督教文明分为西方教会与东方教会两大形态。俄罗斯人则与塞尔维亚人、黑山人、马其顿人和保加利亚人属于东正教文化圈,深受拜占庭文化的影响,这从基辅罗斯时期的语言、宗教与文艺中可以得到充分反映。古代罗斯所建的索菲亚教堂鲜明体现了其与君士坦丁堡的文化联系。

拜占庭文化尽管其宗教信仰是基督教,但它仍保留着希腊式文化,使用的是古罗马法,并按罗马帝国模式来治理国家,这样,拜占庭文化特点不仅由其处于亚欧交界的地理位置所左右,而且也由其连结西方的拉丁基督教与东方的伊斯兰教的桥梁所决定。这些文化特点也深深地烙印在俄罗斯文化之中。

13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俄罗斯人进行了顽强斗争,并于1480年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建立起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国家。随后经反复无常的伊凡强行建立的沙皇独裁政府,于罗曼诺夫王朝形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一方面巩固着专制国家体制使农民沦为农奴,另一方面也在学习西欧国家大力推行改革,开始了俄罗斯帝国的现代化转型。叶卡特琳娜女皇也是如法炮制,一方面尊重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推行一些政策改革,但同时却扩大农奴制,并通过“贵族宪章”使贵族拥有农奴的永久权利,以至于启蒙运动在欧洲曾作为资产阶级兴起的思想武器,而在俄国却被用来作为完成早已开始的君主集权制的工具。1861年,俄国总算颁布了解放农奴法令,可农奴的解放并未使俄国农民成为西方国家意义上的公民,却仍受到村社、家庭的束缚,并没有个人自由。俄罗斯帝国就这样一直在缓步推行西方化与维护专制统治之间游弋,俄罗斯思想界也一直处在西化派与斯拉夫派既相冲突又相联系的张力场中。

19世纪的俄国已从普鲁士边界延伸至太平洋,成为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国,辽阔广袤的疆土却并没有建立起严密的秩序,这使俄罗斯既不满于自己在欧洲的地位,又无力为自己谋求更大的霸权。俄罗斯素有肩负某种伟大神圣使命的宗教理念:莫斯科是第三罗马。这已深深渗透在俄罗斯人的文化精神中,成为俄罗斯民族之魂。有道是,英美人喜谈体育运动,法国人喜谈女人,俄国人则爱谈宗教和上帝的奥秘。因而俄国人“上帝使者”、“上帝追求者”之感。俄国人特有的虔敬感、同情感、

羞涩感带有强烈的宗教气息,他们注重敬拜甚于讲道,对上帝和神性真理怀有热切的思慕,对不幸与受苦者怀有深深的同情与宽恕,对不公正的待遇逆来顺受,以及对神圣象征和神秘主义怀着忠诚。东西方的矛盾冲突构成了俄罗斯灵魂深处的悖论,以至于用理性难以悟解。正如丘特切夫的诗:

俄罗斯并非理智可以悟解,
普通的尺度无法对之衡量:
它具有的是特殊的性格——
惟一适用于俄罗斯的是信仰。

民粹主义、斯拉夫主义、无政府主义、不抵抗主义、虚无主义、信仰崇拜等等思想体系构成了俄罗斯民族的多棱镜,为我们窥见俄罗斯灵魂提供了窗口。

俄罗斯知识分子是俄罗斯灵魂的代表。他们在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文化的持续碰撞中,不断地以西方思想审视俄罗斯生活,又以俄罗斯的情感审视着西方生活,由此带来了一系列反省与批判,促使俄罗斯文化逐步融合着东西方文化。亦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应该意识到自己也是西方,是东西方的综合,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这鲜明表现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中。自18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纷繁复杂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俄罗斯的现代化转型之艰难。这在20世纪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正因为如此,使中国人悟解俄罗斯文化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我们将尽力勉励自己,鞭策自己;为实现此目的而努力,读者亦须警醒自己:除了

理解还需悟解。在此,任何走捷径与省力的打算,都会导致误解与片面。

翻译是一种跨语种、跨民族、跨文化的沟通,它为中国与外国文化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以便消除相互之间由于语言不通产生的隔膜、偏见与误解,使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文化得以交流与传播。它同时亦是一种对话,它将使各民族、各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中俄之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深受俄罗斯文化影响。不过由于当时各种原因,中国对俄罗斯文化的了解仍有缺失。近年来,随着俄罗斯改革的深化与中国的开放,国内已陆续出版了俄罗斯文化丛书(如白银时期),介绍了为中国读者甚少了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流放西方的思想家,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全面了解俄罗斯文化。

值此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正走向世界,世界亦在走入中国。本文库愿与学术界同仁共同完成这一伟业,欢迎学术界同仁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批评指正。文库愿益于中国21世纪新文化之建构,愿益于中国知识分子人格的健全发展,愿益于中俄及中外文化之交流,愿益于中国与俄罗斯以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对话。但愿学术界同仁与广大读者关心、爱护本文库,使其与新世纪携手共进。

殷殷期盼焉,是为序。

“我的命运就是承担世上的一切苦难”

——阿赫玛托娃和她的世界

译者序

在苏联已成为过去的今天这个世界上,在曾经有过的那个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文化丰碑中,安娜·阿赫玛托娃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一座。这位外表柔弱、一生坎坷、终生浸泡在孤独和眼泪中的女诗人,业已成为整个二十世纪苦难缪斯的象征。她用她那充满苦难的一生,怀着对缪斯的一片赤诚,吟唱了一首张扬人性尊严、精神独立和个性自由的歌,为本世纪人类书写了一页最壮丽的诗篇。她是在人性的尊严遭到蹂躏的环境下,高歌人之美丽的诗圣。她的诗,是一首人性的哀歌,也是人类精神的瑰宝!她的诗,已经成为“伟大的俄罗斯的象征”(曼德尔施塔姆语),并且正如洛津斯基所言:“只要俄语存在,阿赫玛托娃的诗就不会泯灭”。

当安娜选择诗人作为其一生的事业时,她其实还未真正充分意识到,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许多年后,当她回想自己当初的选择时,她才真正理解当初父母为什么并不赞成她选择“艺术这一危机四伏的事业”。是啊,父母给了她女儿身,但她的心灵却受造于天。安娜可以听从父母和丈夫的劝告,但却不能不听从命运的安排。而对于后者,一个如安娜那样带有深厚宗教感情的人,岂可有违一二!所以,尽管父亲大人大发雷霆,嫌女儿写诗辱没了他的名字;尽管母亲在听她朗诵后竟哀哀啜泣,叨咕道:“我不懂诗,我只知道我的女儿心里不好受”。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自己的命运,从不后悔。

但母亲的直觉并未欺骗她:她的女儿,的确确实“不好受”,而且,这种非凡人所能承受的痛苦和厄运,竟持续笼罩了她几乎整个一生。她仿佛生来命定是要承受世间所有的苦难和厄运的。嫉妒的命运之神,似乎有意为难她一般,把一切的苦难,加诸于这一美丽的生命之上。举目世界各国整个二十世纪的诗人,还没有什么人,曾经经历过如她那样的厄运。和她的命运比较起来,她的前夫、诗人古米廖夫的被杀,冤则冤矣,但也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幸运。

天意善妒。承命运安排,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一生经历了影响整个二十世纪俄罗斯的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1914年、1917年、1937年、1941年——任何人都懂得,这些数目字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安娜则又是受难最重者,厄运始终如影随形一般,一生跟随着她。但她始终无怨无悔、矢志不移。“生活在这样的年代是我的幸运,让我见识了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她一生中长达20多年,在莫斯科居无定所,食不一处,长期寄人篱下,靠在朋友处辗转为生。她一生中有过三个男人,其中两个被迫害致死——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塔甘采夫案遭诬陷,为了不再愿连累别人溘然而死;第二个(一说第三个)男人、艺术史学家普宁(1888-1953)于大肃反中死于劳改营;她的亲生儿子列夫因父母之过,一生三次被捕,多半生在劳改营度过,30年代末甚至被判过死刑。身为母亲的安娜·阿赫玛托娃,身心所遭受的苦难,非言语所能尽述!她一生可谓与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12岁时,据诗人自述,她穿着一双破鞋满街跑。作为诗人,她一生曾两次遭到官方和半官方批判,长达数十年间不能发表作品,而被迫以翻译和研究为作为谋生之计。

然而,如果我们据此断定:一个身心蒙受如此残酷摧残的诗人,心中想必充满了对不公正的怨恨,那就错了。无论有多少苦难加诸其身,无论命运对她是多么严酷,阿赫玛托娃始终不改其赤子

之心、爱国之情。她爱她的祖国，无论祖国对她多么严酷，她也始终如一地爱着自己的母亲，“虽九死其犹未悔”——正如她所曾译过的中国诗人屈原所说的那样。我们不要忘了，就是这样一个被长期迫害的“笼中的夜莺”，当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仍毅然选择了人民的立场。在法西斯入侵苏联之际，和她的人民一起，勇敢地走向电台，向世界人民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在其他名人退避惟恐不及之时！

1914年。革命前的圣彼得堡。鲍里斯·安列普（1883 - 1969）——当时，正是一位风华正茂、热情似火的文学青年。在一次聚会中，他认识了当时正走红文坛、声望直逼马·高尔基、阿·托尔斯泰、列·安德烈耶夫等大师的安娜·阿赫玛托娃！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安娜把祖母遗赠给她的一枚“黑戒指”，作为爱情的信物，送给了自己的情人。而安列普也把从教堂废墟上捡到的一个十字架，送给她以为纪念。战争吞噬了一切……岁月，匆匆忙忙的聚会和离别。转眼到了1917年，革命的成功迫使白军军官安列普远走英伦。从此一对情侣天各一方。这件事，在安娜的抒情诗里，有过隐约的暗示。在这些充满幽怨的诗里，女诗人默默地谴责了情人的选择——“我不和那些抛弃祖国的人为伍”。即使是在蒙受冤屈的日子里，她也立场鲜明，对国外侨民作家大肆宣扬她在国内如何受迫害，利用她来为“冷战”添加弹药的作法深为不屑。安娜·阿赫玛托娃和屈原一样：“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叹息以掩涕！”如果以为她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安娜是一个只懂得爱别人、爱邻人、具有宗教情感和信仰的人。她的诗，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都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人类的良心！

在其一生之中，阿赫玛托娃多次面临着这样的两难：或是幸福而不做诗人，或是做诗人而失去幸福。每次她都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诗而牺牲了幸福。在这样一首诗中，她道出了自己对诗人使命的认识：

诗人不是普通人

而是精神的化身

哪怕他像荷马一样

瞎了眼，

或像贝多芬那样

失了聪

他仍然能

见其所见

闻其所闻

统摄人生。

诗，是阿赫玛托娃与人民、与时代联系的惟一纽带。诗的使命是与人、与社会交往，是把瞬间变为永恒，是撕破自己反映人生。早在少年时代，阿赫玛托娃就已预感到了自己一生的使命。

金色的月华打造了戒指一枚

睡梦中它把它戴在我手上，附耳低语：

“保护好这件礼物！要对自己的幻想充满骄傲！”

我是不会让度这枚戒指的——无论是谁，也无无论什么时候。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礼物”一词。它在此具有双关含义——“礼物”——在外文中都兼具有“才华”的含义。

当年，阿赫玛托娃在湖边漫步时，想必脑海里不止一次浮现过普希金这位俄国诗歌之父的身影。她既以普希金为其榜样，更以普希金的精神鼓舞和激励自己。和这位生于19世纪的大诗人一样，阿赫玛托娃同样也有理由说自己是在一个严酷的时代，为人民歌唱了自由。她和普希金一样，成为俄罗斯文化不朽的见证！

张 冰

躲在怎样的废墟下,我说!

从怎样的塌方下,我喊!

.....

人们终究会认出我的声音。

人们终将再次把我相信。

——安娜·阿赫玛托娃(草稿)

代 序

我一生中曾经两次有幸逃离列宁格勒：1938年2月和1941年5月。

第一次逃亡使我得以免受集中营之苦。逃跑时我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为什么、因为什么而逃亡，知道自己是在逃避什么。第二次逃亡，正如事后表明的那样，我得以一下子避开两种死法：一种是死于集中营；而另一种当时任何人还未曾见识过，而且当时这种死法还未有过——那就是列宁格勒的死法，即死于围困。

……1938年2月。什帕列尔监狱的小木窗，我把身子弯得不能再弯了，对着那小窗说：“布龙施泰因，马特维·彼得洛维奇”，说着，把钱递了进去。一个浑厚的嗓音居高临下地回答我说：“走了！”里面那人的一张脸嵌在探监人高不可及的地方，并用肘部和肚子把我攥钱的手挡了回去。

“押走了！”我当即就去铸造街检察院去排队。在楼梯上蹲了两三个昼夜后，我总算是进了检察长的办公室。对我的问题，他的答复是，我可以在莫斯科的军事检察院打听到结果。于是，当天夜里，我就坐“红箭”号快车去了莫斯科。次日一早，我在列宁格勒的一个朋友通过电话通知我，说柳莎和奶娘伊达今天要被送到基洛契街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家……对这一信息，我的理解是：有人去了我和米佳在五角街的那套住宅——自从米佳被捕后，我和柳莎及奶娘伊达就住在那儿——那些人是去抓我的。我的推断是对的：那些人真来了，而且，是在零点，当时，我正站在车厢面窗的走廊里，列宁格勒车站的站台刚刚从我身旁掠过。

在莫斯科，我在位于普希金街的军事检察院，听到了在彼时彼

刻完全符合标准的判决词：“布龙施泰因，马特维·彼得洛维奇？十年，剥夺通信权，罚没全部财产”。

那时我们就都已知道，对一个妻子来说，给其丈夫这样一种判决，就意味着逮捕和集中营。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位朋友一大早打电话通报柳莎情况，并坚决规劝我不得回列宁格勒时，我毫不吃惊的原因。当时，数不胜数的众多实例也令我们确信，妻子如果在丈夫被判决后当即出走的话，她们是不会被追究的。可是，毕竟还是有一件事我们当时没想到：“十年监禁剥夺通信权”却原来是枪毙的同义词。在军事检察院听完判决词后，我还不明白，原来马特维·彼得洛维奇已不在人世了。我那时还以为，我必须活下来，必须逃避被捕，不光是为了柳莎，而且，为了米佳也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如若不然，如果连我也蹲了监狱，那么，又由谁来组织营救呢？^①

我到底还是从莫斯科回了列宁格勒，可我没回自己家，也没去基洛契街。我在朋友家呆了两天，并在街心花园里，和柳莎、伊达以及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见了面。我和他们道了别，从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那儿拿了些钱，就走了。

我第一次逃亡的情况就是这样。

起初，我住在基辅米佳的父母家。随后，又移住基辅郊外的沃尔泽利。再迁雅尔塔。没有人寻找我。我从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那儿得到一条信息，说彼得·伊万内奇（暗号，指内务人民委员部）变得稳重了、理智了，已经不再眼红别人的妻子了，于是，我才回家，回到列宁格勒。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米佳那有 1500 卷藏书的图书室被转运到了彼得保罗要塞的地下室，大型家具和过冬物品被搞得不知去向，而像床单、儿童玩具、小皮靴、钟表一类的小物品，则被那些抄家人为了中饱私囊而廉价卖给了不知什么人。

^① 关于物理学理论家马特维·彼得洛维奇·布龙施泰因、关于他的著作、他的命运，以及我们试图营救他的行动，可参阅《……可狱门是何等坚牢》一章。

米佳的屋里住进了一个什么卡特舍夫,瓦夏,这是一个“从那儿”来的家伙,他从被镇压的“人民公敌”那里不光继承了房间,还继承了书架、写字台和钟表。有一段时期我不敢把柳莎带回家,担心自己总归会被捕的,可是,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了,他们没碰我。于是,不再每夜期待敲门声的我,就把柳莎和奶娘伊达领回家,重新开始为解救米佳而奔走。

我日记中最初一部分记载,就是我在第一次逃亡回到列宁格勒后那一时期写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见面。

1941年5月15日,也就是距战争爆发一个月的时候,我被迫第二次离开列宁格勒。这一次是因为一些流言传到了彼得·伊万内奇耳中,说有一份按侦查员们对这份未知文件的叫法是“有关1937年”的文件存在,为此,他们讯问了伊达。(而实际上这是《索菲娅·彼得洛芙娜》,一部有关1937年的中篇小说,是我在1939/40年冬季写成的。)

但关于我的第二次逃亡容我以后再谈。下文中我还要说说我的最后一次出走,我最终从列宁格勒出走是1944年,我的那次出走同样非出自我的本意。

然而,我写于大恐怖时代的这些札记,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里面所记述的统统都是梦境。真实生活我是无法去描述的;不但如此,我在日记里也没有尝试将其描写出来。一则日记体不可能把它全部展现,更何况在那样的情况下,难道有可能记真正的日记吗?在我的这些札记里,有关我们当时的谈话、悄悄话、猜测、缄默,其内容是根本不可能揭载的。那些年中,我有时会找一个什么临时工做做(早在1937年我就被从长期工岗位上撵走了),更经常的,是为了求见彼得·伊万内奇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种种代表而排队,或是起草信件和申诉书;或是和米佳的同事——学者和文学家们——见面,他们也在为给米佳辩护而奔走,总之,一句话,我在

那些年中生活的内容,我的真实生活,我的日常生活,在札记里是被省略掉了的,或几乎被全部删掉了的;或是仅在某些文字中隐约被提及。我和老朋友们,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谈话的主要内容,同样被略掉了。有些地方,我仅仅用某个记号、某个暗示、某些大写字母来表达一些内容——为了永远也不会到来的未来。那些年中,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像是中了监狱的魔法,要求自己 and 他人时时刻刻记取这种东西的存在,并且鄙视那些活得倍儿自在,似乎监狱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人。把我们的谈话都记下来吗?这难道不就是让她冒生命之险吗?可要是关于她只字都不写呢?这同样也会是一种罪过。处于心慌意乱中的我时而写得很坦率,时而写得很隐晦,与此同时,我把我的札记时而藏在家里,时而藏在我觉得更可靠的朋友那里。可无论如何,我在尽一切可能力求准确再现我们的谈话时,总是把我们说话的主要内容——我为拯救米佳、她为列瓦而做的努力;来自这两条战线的新消息;有关“某人在夜里死了”的消息——有意省略或是隐晦暗示。

文学谈话在我的日记里极不合理地被推到了重要位置:实际上,叶若夫、斯大林、维辛斯基的名字,以及诸如死了、毙了、流放了、排队、搜查等字眼,在我们的谈话中所出现的频率,这比有关书籍和绘画的议论多得多。可是,我总是竭力省略那些伟大的监狱活动家们的名字,而把安娜·安德列耶芙娜讲述的,有关罗赞诺夫、莫迪里亚尼、甚或只是有关拉丽萨·赖斯涅尔或吉娜伊达·吉皮乌斯的故事,一一记录了下来。从物质上吞没了一座城市整整一个个街区的、而从精神上吞没了我们无论是醒着还是睡梦中的全部思想的监狱;从报纸向每一个栏目、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谎言的监狱,要求处于那种情况下的我们,即使是在一个对一个人的四堵墙里,也不要轻易提及它的名字。我们那时却是些不听话的人,我们常常提及监狱,可与此同时,我们又隐隐约约怀疑,当时即便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的场合下,实际

上也不止我们两个，肯定有人在不断地盯着我们，或更确切地说，在偷听我们。被沉寂所环绕的监狱，想望着成为既统治一切又并不存在的某种东西；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由于某个什么人的某一句话，而使它从威力无边的非存在中浮现出来；监狱就在我们身边，近在咫尺，而与此同时，它似乎又根本就不存在。那些妇女们在排队时或一言不发，或悄声细语，彼此交谈时仅仅使用一些形式不确定的话语：“来了”、“抓走了”。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话，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列耶芙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

随着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我的片断札记越来越不像是在记述我自己的生话，而是变成了安娜·阿赫玛托娃女士生平逸事录。在环绕我的那一透明的、幻境般朦胧的世界里，只有她一个人看上去不像是梦，而是清晰的白昼，尽管在此期间她一直在写着有关幽灵的东西。在所有闪烁不定的非确定性中，只有她是无可置疑的、确实无疑的。那些年中以我自身所处的精神状态——默默无闻、死气沉沉——而论，连我自己都不再感到自己真的是个活物，觉得我的糟糕之极的生活不值得去描述（《好在都过去了》）。到1940年，我已经几乎从不记述有关我自己的札记了，而关于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我却越写越多。我渴望写她，因为她本人，她的话语和一举一动、她的头颅、肩背和手的动作，都是那么完美无瑕，在这个